

## 朱士嘉对北京图书馆的学术致谢

□ 孟化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我们在多个场合听到关于图书馆与读者及学者关系的比喻：“书如水，读者如鱼，图书馆如海洋。”我们也看到不少学者在介绍自己的学术成果和治学经历时，都满怀深情地感谢图书馆对自己的无私帮助。这里就想和大家一起读读这篇感谢北京图书馆的文章，来自历史学家、方志学家朱士嘉。

朱士嘉（1905—1989），字蓉江。1924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参加禹贡学会，在顾颉刚主编的《禹贡》半月刊上发表有关中国地方志研究的文章。大学毕业后，考取同校硕士研究生，于1932年获硕士学位，留校任图书馆中文编目部主任，兼任辅仁大学历史系讲师。同时，与燕京大学研究生谭其骧，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黄现璠等及清华、北大等校一些历史系同道，发起组织北平史学会。这时他又参加了地理学会，常在《地学》上发表文章。他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时，就在老师的指导下广泛涉猎全国各地志，积累资料，着手编辑《中国地方志综录》。该书于1935年出版，是一部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具书，实用价值极高，引起了国内史地学界的重视，也引起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注意。该馆东方部主任于1939年邀请他赴美。他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的3年内遍览馆内东方部特藏之一的中国地方志。

1946年7月至12月，朱士嘉进美国档案馆学习档案管理法。这时他已获博士学位。他在学习期间，不仅注意搜集中美关系档案资料，同时还关注“美档”所藏有关欧洲各国档案馆的历史资料。他在这时所收集到的资料，在回国后都交给了国家档案馆。翌年，他受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远东系之聘，任该校副教授。在研究生的帮助下，又搜集、整理了中美关系档案资料胶卷300多卷。这时，他参加了美国远东学会、美国地方志学会和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1948年，他积多年研究心得而撰写的论文《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中文档案》，在远东学会年会上宣读，颇得好评。

1950年春天，他毅然决然辞去了华盛顿大学的优厚职位，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50年9月，朱士嘉在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兼任该校图书馆馆长。1953年，他在李达校长的支持下，调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工作。从1958年到1960年，一面修订《中国地方志综录》，一面校补张国淦遗稿《中国方志考》。为此，他自费赴南北各地调查，获得很多资料，并在此基础上，革新体例，充实内容，编写了《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了8000多部地方志。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天文史料整理组利用它在各地图书馆找到了大量天文资料，编成《中国天象记录总表》和《中国天文史料汇编》。1981年7月25日中国地方志协会正式成立。1983年9月9日，中国地方志小组经批准同意恢复组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更名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朱士嘉被推为协会副会长，并被提名为指导小组成员。

朱士嘉以高度的热情投入这一工作，写了不少文章。其中有：《整理研究地方志刍议》《中国地方志的起源特征及其史料价值》《中国地方志浅说》《推陈出新，编好社会主义新方志》《顾炎武整理研究地方志的成就》《谈谈清代学者论述修志的问题》等。

那么，朱士嘉这些突出的成果是怎么来的呢？

朱士嘉在其《宋元方志传记索引》中写到：

地方志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早在后汉时期它已经诞生，到现在有二千年的历史。但是流传于世的不过七千六百多部，散逸部分实在不止此数。从汉代到唐代，散逸的情况更严重，现今我们从唐代的《沙州图经》《西州图经》，清代的辑逸丛书，以及其他个别辑本方志中只能窥见古方志面貌的一部分。

从汉代到唐代这一个时期编纂的方志着重地反映了各地区的地形、气候、疆域、土产。察其内容，不出严格的地理书的范围。到了宋代，方志记载的范围才从“地理”扩充到“人文历史”方面，“人物”和“艺文”在宋代方志中逐渐占着重要的地位。关于“人物”资料，更受到重视，因为它广泛地反映了政治、经济、社会的活动，也反映了各族人民对于工业（主要是轻工业、手工业）、农业、科学文化事业所作出的显著成就。

宋代方志的体例比较完备，内容比较充实，这是与当时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史学、地理学的突飞猛进有密切联系的。在体例方面，宋志上承《史》《汉》余绪，下为后代方志编纂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果说，汉以来修史者无不奉《史》《汉》为圭臬，那末，宋以来修志者几乎莫不以宋志为楷式了。

《宋元方志传记索引》是为了适应科学研究工作者特别是历史研究工作者参考传记资料的需要而编辑的。这部书的体例和内容虽然与《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和《辽金元传记三十三种综合引得》有所不同，但仍具有相互补充的作用。

北京图书馆张秀民同志对本书的编辑给以热忱的支持和帮助，编者对他致以恳切的感谢！本书之能和读者见面，又是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支持与鼓励分不开的，谨此一并致谢！

张乾若（国淦）先生生前的题签，是很珍贵的纪念，现有机会把它刊印出来，是编者感到欣慰的<sup>①</sup>。

朱士嘉在这篇序言中所感谢的单位和人员，第一个就是北京图书馆的张秀民先生，其实就是北京图书馆。因为这不仅是北京图书馆给张秀民先生提供了极其宽松便利的工作环境，因此才有时间精力为朱士嘉所从事的《宋元方志传记索引》提供帮助，还因为北京图书馆收藏的丰富地方志文献也直接成为了朱士嘉从事这项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特别是他的工作对象就是宋元方志，现存宋元方志大概有一半以上收藏于北京图书馆，朱士嘉不可能不经常性地光顾此处。据有关资料，1931年利用北平图书馆研究室的就有朱士嘉，而且研究方向正是方志<sup>②</sup>。因此，我们说他这里的感谢一定是真诚的也是真实的！国家图书馆如果能将类似朱士嘉这样有成就学者的致谢集中起来，将不仅可以看到图书馆的工作成绩，也能发现中国学术的发展轨迹。这也是我这里要特意介绍朱士嘉这篇序文的基本初衷。

我在国家图书馆所藏地方志文献中，还曾看到过朱士嘉签名题赠给陈垣先生的《宋元方志传记索引》，上面有他1963年8月10日亲笔写给陈垣先生的赠书题记：“援庵老师早在三

<sup>①</sup>朱士嘉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宋元方志传记索引》，中华书局，1963年，第1—2页。

<sup>②</sup>参见孟化：《国家图书馆与近代文化（1919—1949）》，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02页。

十年前就对同学们指出索引工作能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意义。嘉能勉成此书，实与老师的教导分不开的。举以奉赠，聊表谢忱，并请指正！”朱士嘉认为，正是在陈垣先生关于索引工作的指导下，他才开始并完成了《宋元方志传记索引》的工作，因此他要第一个向老师呈交作业，并致以谢忱。而陈垣先生也曾以教育部次长身份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因此，朱士嘉因为《宋元方志传记索引》而再次鸣谢老师的教诲，其实也是对于北京图书馆的感谢。这与他在序言中致谢张秀民先生是遥相呼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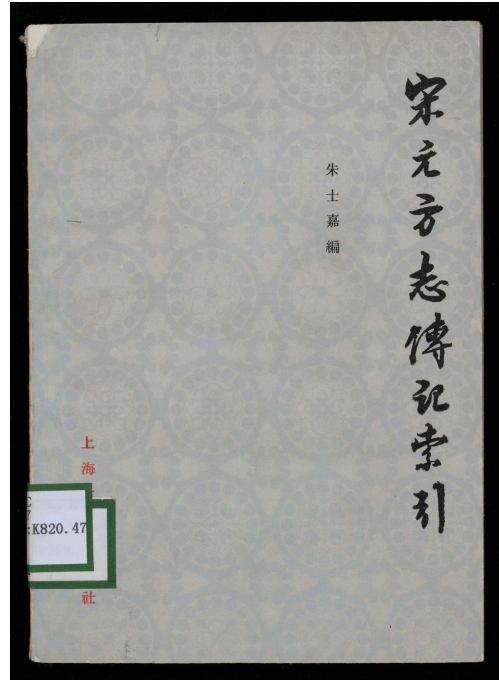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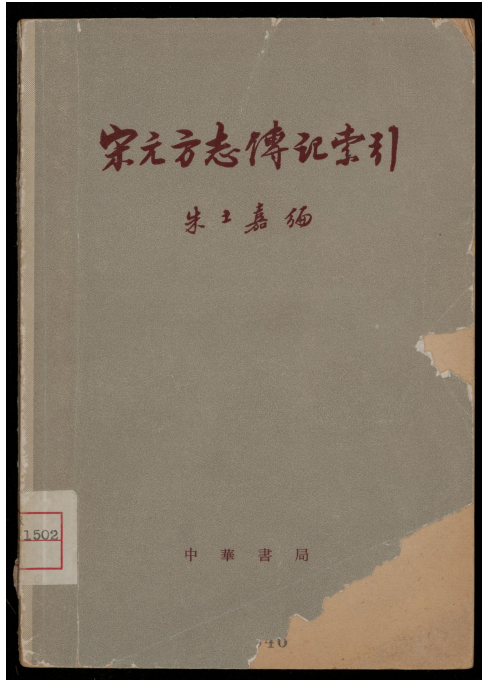


图1 1963年版《宋元方志传记索引》封面 图2 1986年版《宋元方志传记索引》封面